

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by

JAMES LEGGE

IN FIVE VOLUMES

II

THE WORKS OF MENCIU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引言

费乐仁

根据《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内容与特征,我们了解理雅各在开始大量包含注释和索引的英文翻译之前,就写下一篇详尽绪论。^①他这种仔细周到的学术典范受到历代不同国家能接触到此书的汉学家、中国研究学者和学生的赞赏。^②理雅各的英译《孟子》,采用拉丁译名 The Mencius;内容包括这部儒家经典的文本历史,孟子生平及其“影响与观点”的梗概。^③在对孟子生平和著作的描述和评价末尾,理雅各附上孟子的24个主要弟子及他们生平的简介,及与研究孟子有关的最新中文和拉丁语资料目录。以上所提到的都能够在第一卷中读到。

理雅各在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中,对孔子生平及其著作作了刻薄讥讽的评价,然而,在第二卷里却有意想不到的内容。^④从跨文化基督教传教的当代批判角度出发,他们是否中国或欧洲世俗主义学者,采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解释立场。^⑤简明地说,理雅各把孟子当作哲学家、夫子和“对话者”或辩论家来尊崇。他在第二卷绪论中的言论,也许会使从未读过理雅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译本的读者大为震惊:

[孟子身上]有一种“英雄式”的特质,他还是辩论家。他本人自称并不喜欢辩论,但若必须辩论,那么他就会是辩论雄才。他在据理论证上不时表现

① 请见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绪论部分。

② 关于评价,请见费乐仁著“James Legge”,载于Chan Sin-wai与David E. Pollard主编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第401—422页。

③ 理雅各最早翻译《论语》、《大学》、以及《中庸》的英译书名,都已经成为一个多世纪来汉学文学的标准英译名。虽然在后期,理雅各更喜欢使用17、18世纪耶稣会前辈们用的《中庸》英语译名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和《孟子》英文译名The Mencius。

④ 读者可以在《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序言中找到相关问题,及对这个问题有探讨的其他关于理雅各生平和著作的文献。理雅各在1861年出版第二卷;但这次再版的是1893年和1895年分别在牛津出版的第一、二卷的修订版。

⑤ 关于这些批评家的解释立场的描述,摘自研究现代中国基督教传教史的当代中国学者顾长生的作品,请见费乐仁著“In the Eye of a Tornado: Lessons Learned from Critiques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Ching Feng 8:1—2 (2007),第91—116页。

出的足智多谋和细微洞察力,令人不得不赞赏。相对于孔子来说,我们更倾向孟子。他给人如此亲近的感觉。他虽不像孔夫子一样给人[醒世],但更受人敬仰……^①

那些带着教官帽子、皇冠或穿着大袖法衣的天主教神父、僧人或基督新教的神职人员,高高地站在庭院或宫殿中,拥有的权柄不会让身为“夫子”的孟子感到逊色。……例子的巧妙运用以及展现出的魅力属于孟子,这位中国哲学家。……我已说过即使没有孔子那样的“醒世”,他也能够受到更多的敬仰。也许应当评价他是更为睿智的人。^②

这里,由于跨文化的重要性和汉学感知,所以有许多值得进一步阐述:理雅各论及“英雄”,赞同“辩论”,读到《孟子》中的足智多谋和细微洞察力,领悟到孟子政治上的杰出才能以及这位中国哲学家的魅力和智慧等。在真正开始探讨理雅各关于孟子作品和教义的上述方面之前,我们从细节方面介绍一下这卷的特点和内容。

甲、《中国经典》之第二卷

虽然理雅各并不是第一个用欧洲语言或英语翻译《孟子》或《四书》的人,但他 1861 年首版的英译《中国经典》在汉学准确度、翻译方法透明度和理解二手资料的广度上都设立了新的标杆。正如 Norman Girardot 所说的那样,理雅各开辟了英国历史上以“理氏”风格著称的现代汉学新时期,这是因为理雅各的汉学造诣与理氏不同版本的《中国经典》持续再版产生了重大影响。^③理雅各英译版《中国经典》的《四书》不仅是 19 世纪欧洲汉学的一个先例,而

① 引自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5),修订版,绪论,第 43 页。

② 分别引用自 1895 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52 页、56 页、57 页。“mitred front”,“shavencrown”,“Geneva gown”指基督教领袖的不同教派。他们分别参考了英格兰圣公会或罗马天主大主教或传统国际基督教的更高派别,罗马天主教的僧人,或瑞士卡尔文主义者;在这段文中,我们能够想到理雅各的睿智,间接地将坎特伯雷的圣公会大主教、罗马天主教主教和改革派约翰·加尔文都引用到了。事实上,理雅各是苏格兰公理会成员,他对孟子品德和道义的赞赏不仅限于这段话,我们将在后面的内容中更加具体地讨论这位重要的解释学的领军人。

③ Girardot 认为这个时期开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持续到 20 世纪末。详见“The Leggian Epoch of Sinology”,Norman J. Girardot 著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第 142—144 页。

且在伦敦数次出版后,以这些卷册为基础的“现代版本”也呼之欲出。^①

最初英汉双语版《孟子》与整套《中国经典》在1895年再版,随之成为经典译作[canon—in—translation];也就是说,在儒家经典英译过程中,这些卷册逐渐作为经典文学影响欧洲文坛。^② 19世纪末期,理雅各翻译的不仅是钦定标准中文版本的《四书》,由宋代著名儒家学者朱熹主编;而且其中第二卷《孟子》,在当时中国兴起“哲学”新学科时产生了影响。虽然这并不是文化转型期间的唯一影响,但是理雅各的英汉双语译本被涌现出来的大专院校,特别是晚清建立的各类教会学校里广泛应用,占有一席之地。^③ 20世纪40年代,儒家经典文学从传统教育的主要科目转变成现代公立大专院校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选读教程。1904年,传统科举考试废除;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政府,这一切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乙、《中国经典》第二卷之绪论

第二卷的前言中,我们知道理雅各从“商业精英”查顿兄弟与 John Dent (戴内德)处获得资金赞助。戴氏还帮助那些对《中国经典》感兴趣的“无国籍、无教义”之分的基督教传教士读到这样的著作。有很多人在关注“文化帝国主义”以及与早期进行鸦片贸易发财的商贩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与研究他们。理雅各本人十分反对鸦片贸易,由于香港殖民

① 这些现代版本的作品虽然采用不同格式,但是译名仍是《中国经典》。伦敦 Trubner 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与理雅各达成了一项协议:理雅各的修订版作品以不同格式出版,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1872年的第二卷,是“现代版”的《孟子》。第三卷原本包含韵律版的《诗经》,于1876年在伦敦出版。出现如此不同的原因是编辑们将翻译每页顶部的中文部分去掉,还将评论性的注解也减少,只剩下英文翻译和偶尔的注释,这就让整部作品的特点不同。为了迎合这样的特点,理雅各采用现代英语代替先前古代化词汇。

② 关于术语“经典译作”的阐述及与理雅各的译文集的关系,请见费乐仁著“Classics or Sacred Books? Grammatological and Interpretive Problems of Ruist and Daoist Scriptures in the Translation Corpora of James Legge (1815—1897) and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载于 Max Deeg, Oliver Frieberger, 和 Christoph Keline, 主编 Kanonisierung und Kanon—bildung in der asiatischen Religionsgeschichte (Canoniz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siatic Religions)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第428—469页。

③ 请见费乐仁著“The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Disciplinary Crucible in which Chinese Philosophy was Formed”, 载于 John Makeham dealing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20th Century China, 即将于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地政府接管鸦片经营,所以查顿两兄弟以及他们的公司再也没有直接从事此类的生意。在1894年,最后的一整套卷册由传教士购买后,带到了朝鲜半岛。这就表明了理雅各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在东亚各国是如何受到关注的。^①

(一)绪论中所期待的内容

在1861年的版本中,理雅各对《孟子》形成和历史做了详细的描述。在文中,他指出《孟子》刚开始并没有作为儒家经典中的一部分。直到宋代,在它问世后一千多年,才得到重视。^②孟子死后来才被尊称为“亚圣”,^③理雅各对这位被忽略的先秦智者如何成为中国历史上圣人的转变进行了阐释。

在对孟子生平及著作全面介绍后,理雅各也承认关于孟子的文献并没有像孔子那样多,所以对孟子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列举了所有知道的与孟子有关的弟子,共24位,远远低于有文献记载的孔子至少80位弟子。^④随后附有注释的书目录,只有三个书名,其中两个是中文,另一个为拉丁文。^⑤这两部中文作品为哲学家墨子和唐代文人韩愈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他们二位将在后续的绪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孟子》拉丁版译本则为一部多卷译本,译者是法国著名学者儒莲(1797—1873),他的译本采用一种现代研究方式,理雅各非常重视其注释。^⑥为什么这卷参考文献比《中国经典》

① 理雅各在19世纪60年代写了一封信,里面描述他和家人去日本旅行时,被一位日本海关官员认出他是《中国经典》的作者,并赞赏他。到了19世纪90年代,理雅各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关注。其中一些并没有赢得相同的呼声,比如说在美国和上海出现美国人和中国人抄袭他作品,这些出版的书都不是以理雅各的名字出版的。

② 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1—4页和第9—13页

③ 因为一位国外学者认为其译名属于“二流”,这个比喻带有严重的负面意味。理雅各就此解释注解中的标题实际含义。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39页,特别是脚注1。

④ 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76—78页的目录。这个目录包括了汉代学者赵岐没有提及到的四位弟子,他们被后来的学者发现。

⑤ 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123页。

⑥ 在理雅各出版作品之前,他多年与儒莲保持书信往来,以及之后在翻译上征询儒莲的建议。理雅各对汉学研究做出的贡献赢得儒莲的高度赞扬。在儒莲死后,1875年首个“儒莲奖”就颁发给了理雅各。应该注意的是这位法国学者的名字是“Stanislas”而不是“Stanislaus”,请见《中国经典》第二卷书目录。更多有关这位法国学者对汉学的贡献以及与管理雅各的友谊,详见David B. Honey著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第29—33页和第220页。

第一卷中的文献要简明呢?因为第一卷开头的目录包含了很多和《孟子》相关的著作,所以,理雅各只需在必要时,让读者参考目录部分。^①

理雅各对《孟子》研究的特色:

首先,当理雅各出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的第二版时,他只对中文名字和专业术语都进行修改和更新。并没有改动任何他在1861年所作的评价或结论。相比第一卷中的实质性修改而言,这表明了理雅各在他传教和学术生涯期间,对孟子的生活及其著作的理解与赞赏基本没变。我们将在后面的讨论中证实这点。

其次,有一部注解是儒家经典研究学者感兴趣的。理雅各在翻译并出版了他的著作后,才发现清代学者焦循(1763—1820)对《孟子》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理雅各将他的作品与宋代孙奭(962—1033)的评论做了比较,感叹道:“我后悔我没有更早知道《孟子正义》这部作品。”^②事实上,他在这卷的绪论中提到过一次,但是没有在他翻译评论中涉及。^③今天,研究《孟子》的学者认为焦循的评论是儒家作品最好的评论之一。^④因此,理雅各也承认自己在历史和解释方面的局限性。

最后,根据《孟子》一书,理雅各撰写了孟子生平事迹。关于描写孟子母亲的事迹和态度的故事,^⑤他所作的评论就不是借鉴《孟子》;但他意识到这些

① 理雅各正在做一卷中的参考文献研究,会在后续的卷册中陆续添加一些第一卷中没有提及的书目。结果发现,这卷书目录属五卷当中最短。在脚注中,理雅各对最初的参考文献只是做了大概解释。通常诸如这种形式:见第一卷绪论(接着是标题出现的页码)。更多例子请见1895年版的《中国经典》第二卷,第9页,脚注1;第10页,脚注1;第12页,脚注1和第39页,脚注4。

② 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9页的评论。值得研究的是,理雅各是否在他牛津教学中更多地引用到了焦循的翻译。在1877年,他做了一场关于《孟子》的讲座,讲演稿没有公开,藏于牛津的Bodleian图书馆。

③ 引自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三页的第一个脚注;是对赵岐所作前言的评论。

④ 在焦循的自传中说到“考证是需要理由以及认识来确定的”。焦循在生命即将结束之前写下了《孟子正义》。详见Rebekah X. Zhao著“Jiao Xun 焦循 1763—1820”,由Xinzhong Yao主编RoutledgeCurzon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 — Volume 1, 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第295—296页,引见第295页。有关焦循对孟子人性理论的描述研究可见何泽恒著《焦循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5月,第163—210页。

⑤ 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16—18页中有关孟子母亲的阐述和评价。

故事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孟母品行的影响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都讲求忠贞;所以理雅各通过不断寻找历史和传说的差异,以求刻画一个完整的人物。

与第一卷排版一样,每页主体部分,上方是 18、19 世纪清朝标准中文文本,中间为理雅各英文翻译,下方是用小体字书写的注释。作为《四书》中最长的译本,理氏排版的《孟子》长达 375 页之多,^①这比《论语》长一半;同样,它比第一卷中的三本儒家经典英译页数的总和还要多 75 页。由于原文太长,理雅各在该文最后只是加入两个索引(主题和人名)。^② 目录的最后部分还是保留了中文汉字词汇表,整卷是以 72 页的基本概念、语法提示、详解的相互参照体系结尾。^③

(二)绪论中的不同表态

《孟子》一书的形成与真实的历史一致,书中我们发现了一段对《孟子》一书最早整理编排与注释的汉代儒家学者赵岐(约 108—201)生平的介绍。理雅各对自己增加这部分长内容解释道:“像大多数学者一样,他的名字也应该出现在这里。这是因为他们都是从追求文学和哲学中平息内心的痛苦。”^④ 换句话说,赵岐的品行中有一种英雄特质,吸引了理雅各。在理雅各一生中,他一直在追求这种品行;也反映出在理雅各所处的时代,在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影响下的苏格兰文学的主要思潮。1841 年,卡莱尔出版了 *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论英雄,崇拜英雄与历史中的英雄概念》),这本书中所说的观点曾经被年轻的传教士理雅各所采用,尽管这位苏格兰作家以辛辣嘲讽和反对一切对基督宗教传统形式的忠诚著称。卡莱尔这种英雄的概念是如此地具有贵族阶级的视角,提到的英雄都是受过教育、有文采且发表过重要著作的人,虽然他们在人性上不是完善的,但是在思维和行动上他们具有创造力并充满着激情。在那个时代,理雅各同其他很多人一样对这样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他还很好地借鉴卡莱尔的观点运用到一些有名的中国学者身上。在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理

① 七册书(每本分成两部分)中从第 124 页到第 502 页。

② 1895 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503—513 页。

③ 共 18 页,比第一卷中字典和单词表长。在标题下的副标题“intended also to help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a dictionary and concordance for the classics”详见 1895 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请见 514—586 页,引用部分在这章节的第一页。

④ 引用自 1895 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6 页。这部分是献给如赵岐和其他对《孟子》的整理与注释的人。详见这卷绪论第 4—7 页。

雅各以基督新教传教士和汉语学者的身份为当时香港殖民地反叛英国官员和社会的平民英雄。^① 1861年,理雅各把对赵岐的英雄特征赞赏,扩展到孟子身上。^②之后,他也将这样的英雄称号赞誉两位先秦的政治家。^③但是直到1872年,他仍然觉得孔子并不适合这样的赞誉。为此,在《中国经典》第五卷和最后一卷的引言中,理雅各抱怨道:^④

我的内心不会对这样的指责做出回应,说我寻找机会去贬低孔子。相反,对于孔子及其教义,我觉得有更加适合他的评价。但是,我并不认为孔子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

理雅各回到牛津后成为其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第一任教授。如果理雅各想给孔子生平和著作做出一个更为积极的评述,那么他需要更多年的历史研究和反思。出于一种责任心,理雅各做到了这件事情。然而,在苏格兰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我们也能够看到理雅各被孟子的另一个特质所吸引。

在《孟子》的无畏教义中,孟子的正义与礼仪让我们相信那是最让人感兴趣的部分。这位中国哲学家提倡让统治者为民百姓提供资源和教育服务。关于这一点,理雅各高度赞赏,与同时代相比,这些方法已经是相当进步了。欧洲的教育体系需要等到两千年之后,才能形成这样的公共教育。^⑤ 在理雅各的眼中,这些都是统治者应尽的责任。从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苏格兰文

① 理雅各对“英雄主义”产生兴趣,并且后来成为早期香港殖民时期受欢迎的人。请见费乐仁著“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第二卷中“two Scottish styles of Victorian prophets”以及理雅各后来被香港政府承认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尔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该校在1884年300周年的仪式上授予理雅各博士学位,可惜的是卡莱尔在典礼前三年就已经过世,没能亲自参与。

② 理雅各称孟子为具有“英雄主义”的人物。1861年,当给孟子事迹做概述时,理雅各就使用了卡莱尔的术语。在1895年的修订版本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或者结论,理雅各都没有任何的改动。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41页和43页的评论。

③ 香港出版的早期汉学作品之一。详见理雅各《中国评论》1:6(1872—1873年)的“两位中国历史上的英雄”,第370—381页。在文章中,他讨论了中国两位先秦圣贤,晋文公和齐桓公(载于《论语》14:15.,1893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第281页)。通过研究《左传》和《春秋》中的记载,理雅各相信他们两位已经成为了中国先秦历史上前瞻性的英雄人物。

④ 引用自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卷(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社,1872年)绪论,第51页。

⑤ 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48—50页理雅各对这些问题的评论。

化影响的另外一面,这可能受到亚当·斯密(1723—1790)的自由经济观点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对基督新教关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价值观之补充。《孟子》里面的经济看法与斯密说法一致:提倡“分工”。理雅各引用儒家经典中各种段落来证实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普遍法则”。^①此外,理雅各钦佩孟子大无畏地批判他当时统治者的腐败与堕落。^②由于孟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理雅各在中文的基督教宣传册中,不时引用《孟子》中的重要段落。^③在这卷中,他也提到了和其他的传教士是如何写出和孟子精神立场相关的文章,还有在1858年的科举考试期间,在考场附近的基督教堂外悬挂这些孟子教义。^④通过这种方式,理雅各同其他外国和本土基督传教士一起,结合孟子的教义向中国知识分子与老百姓传福音,促进基督教教义和精神主旨的反思。

对于孟子教义的价值,理雅各确认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性善的理论研究。是“世界范围的关注”,理雅各对这些教义进行了详细阐释,将这位中国哲学家的理论与十八世纪圣公会牧师和学者 Butler 巴特勒主教的理论进行比较。

① 引用自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51页。随后,他引用了当代英国汉学家约翰戴维斯的观点。

② 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51、52页的解释。

③ 在这些作品出版之前,出于传福音目的,理雅各用广东语和中文出版了基督文章。理雅各从《孟子》一书中采用了很多的例子。他这样是用来向中国学者证明圣经的价值观念。详见费乐仁著“The Mengzian Matrix for Accommodationist Missionary Apologetics: Identifying the Cross—Cultural Linkage in Evangelical Protestant Discourse within the Chinese Writings of James Legge (1815—1897), He Jinshan (1817—1871) and Ernst Faber (1839—1899)”, *Monumenta Serica* 50 (2002), 第391—416页。

④ 详见1895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52页脚注1,关于广州城中《孟子》的福音传道的运用。这段来自《孟子》7B:34,并且能够在这卷的第496页中找到。在理雅各和何进善牧师共处的时间里,他们在广州共同培养一位年轻的广东福音传道者,这个人就是太平天国天王的小表弟,当时被他们对政府腐败的大无畏批判所震撼。在后来的1859年,当洪仁玕(1822—1864)从南京带着他的太平天国部队北征,来支持他的表哥洪秀全(1814—1864)。在香港,理雅各和何进善意识到这些教义没有让太平天国天王找到通往基督教义正统观念的方向。在香港,理雅各、何进善和洪仁玕三人之间的交情持续了四年。在1859年到1864年期间,太平天国军队被打败了。洪仁玕的生活深深地影响到了理雅各。理雅各说到他后来是如何滥用权力的,所以离开了这个非基督视野的生活圈中。在1864年,理雅各听到洪仁玕的死刑而非常伤心。在理雅各的生平和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重要的历史事实研究。见费乐仁著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第二卷中32—33页、39—44页、48、51页、59—60页和229—233页。

在仔细对比后,理雅各的结论是恰到好处,并且充满了对中国哲学家的钦佩。^①

在英格兰,弄清楚[人性]主旨的中心是否是在大主教巴特勒身上,……但是这位主教的观点和孟子的观点如此相同。基督新教的高级教士的优势在于能准确运用术语,使得整体更为紧凑;例子的巧妙运用以及展现出的魅力都属于这位中国哲学家。他们的教义是一样的……孟子年长于芝诺,可是二人生活的一些部分是相似的。当然大主教巴特勒是独立于孟子所提倡的观点,但我个人认为孟子已经没有留下什么让巴特勒去发现了。

这并不是说理雅各同意孟子教义的每一个观点,但我们要凸显这位苏格兰传教士对孟子作品中有关道德、政治及风格的赞赏。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理雅各对孟子的道德、宗教与政治教训与行为的关注,但是没有一个能掩盖理雅各发现的孟子的英雄素养。

(三)绪论中的不同内容

因为理雅各相信关于人性的问题是世界范围内都关心的哲学问题,他也记录下了先秦时期讨论到这方面的中文作品。在没有欧洲学者见到这些作品之前,在中国的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发现理雅各曾提到的内容。^②苏格兰学者决定将这些中文材料都翻译成英文,附录揭示了不同观点,^③其中包括荀子(约前 313—约前 238)主张的“人性本恶”的观点。^④后来韩愈的作品写到人性有三种能够将这种矛盾化解。^⑤虽然理雅各只做了引言的解释,但是他对《孟子》的有关言论并没有表达完整。

孟子鄙视同时代的两位学者:杨朱(约前 4 世纪)和墨子(约前 468—约前 376)。杨朱是一位享乐主义者;墨子是强调以人民需要为主的“兼爱”式功利主义者,提出一系列军事平民论。为了让读者明白孟子对特殊观点有足够

① 引用自 1895 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 56—57 页和第 64 页。

② 见 Rev. Griffith John 的文章“The Ethics of the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octrines of Hunan Nature and Sin”载于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59 年 11 月出版。另一篇文章由 Rev. Joseph Edkins 著 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London: 1859)。有关两部作品,请见的《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78 页和第 118 页。后者在脚注 1 中,但是很明显的放错了位置。如果是上文中提到的作品,那么会出现在第一卷的参考书目中,即理雅各 1893 年版本的《中国经典》第一卷绪论第 136 页。

③ 详见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 78—91 页的附录。

④ 该翻译出现在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 79—88 页。

⑤ 详见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 89—91 页的短文。

的认识,理雅各节选了有关这两位作者的章节。^①当理雅各找到理由去批判他们的论理立场时,自发地青睐于墨子所支持的一神论。此时,他也是谨慎地对待自己宗教理解上的局限,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有各种一神论,如他亲见的太平天国教训(1850—1864年盛行)和19世纪儒家学者罗仲藩(活跃于大约1820—1850)的《大学》里上帝主义教训。^②理雅各对墨子的观点十分严谨地对待。理雅各随后又翻译了能够解释这两位学者不同观点的译本,出于对唐代学者韩愈文章的兴趣,理雅各再次完成了对这两位学者作品的评论。虽然早在一千年前韩愈已经说过了类似的评价,但是理雅各仍然采用了他认为正确的观点,虽然孔子提出注重家庭成员关系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也同样想象若把这种家庭关系扩展到社会或者统治阶级内部,这个世界将会有很大的进步。从这方面讲,韩愈说到他的教训是和墨子的道德观念相一致的。为什么人们要反对他们的教训呢?这是只是因为他们后来的弟子使他们的观点对立化,而不是认同他们的共同点。因此,韩愈坚信若孔子和墨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甚至是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两人将相互支持他们的教训与实践,而不是相互排斥。与此同时,很显然,韩愈指责“后面的弟子”造成了这些意识形态的冲突,理雅各推断出孟子是属于那批爱争论的人之一。理雅各在引用韩愈文章长达几乎整页的内容之前,写下了自己的看法。^③“在这件事情上,我很高兴自己与‘文学太子’(Prince of Literature)韩愈的观点一致。”

在这篇文章中,理雅各提出了自己在跨文化学术和方法上的几个特点。理雅各会给读者充分的信息并且给出已知信息的英文译文。在2010年,我们能够想象理雅各听到《荀子》和《墨子》的整套英译注解版本出版之后,将会是多么的高兴。^④在很多方面,理雅各在古籍翻译与阐释方面的先例已经成为标准,这种标准仍会继续在跨文化领域里发扬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学识全面性的关键所在。只要理雅各发现任何一位中国学者的观

① 出自绪论第三章中的翻译。详见1895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93—97页关于杨朱和101—116页关于墨子部分。

② 是一位广东官员给旧版《大学》写下的特殊评论。在《中国经典》第一卷中,理雅各将这部著作仔细阅读并写下自己评论。详见第一卷中绪论关于此人物的介绍。

③ 1895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120—121页中寻找来自韩愈的引用以及理雅各的评论。

④ 这部三卷的作品有《荀子》的介绍和翻译。这部作品由John Knoblock所写并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和1992年出版。《墨子》的翻译和解释由Ian Johnston著于2010年,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点与自己的观点相同,那么他就会将他们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在中国学术界,理雅各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他寻求不同的能够指引他的本土资料,能够引导他在更多的问题中做出更加肯定的评价。作为一位国外传教士和汉学家,理雅各在做任何古代经文解释时,都会自己先研究并决定采用哪些资料的立场。理雅各对学术的态度来自当代苏格兰实在主义或常识哲学的研究和他在公理会教派受到的比较自由的福音派基督新教培养的经历。^①前者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观重新解释的基础之上的。理雅各坚信每一个文化都有共同的真理,这类真理能够被理性的人通过仔细观察并且思考着人类的问题而发现。理雅各又从不从国教的基督新教的立场上,认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责任来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做最后决定之前,人们应该认真思考任何有关忠诚于上帝于其他人的问题。作为一位传教士学者和汉学翻译家,这些原则给理雅各建设性的引导。同样的诠释学原则通过在这一卷里详细评价关于人性、伦理与政治的责任等问题上的不同方法,以及最好生活方式的视角显示出来。

丙、理雅各对《孟子》所做的跨文化研究的思路

如果我们将欧洲教育观念——即用哲学历史与圣经传统的来看,就会发现《论语》和《孟子》的不同。前者更像是箴言的圣经书;相对松散的谚语与言论集,有时扩展为简短对话,但没有特定的主体框架;后者是围绕特殊人物来组织,每个人物的名字就是该册的书名,共七册。每册(最后一册除外)都是长篇幅叙述孟子与对话者之间的对话。从这个角度看,这更加看起来像是柏拉图式的对话,是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与众多人一起讨论各种话题。这是理雅各在英华书院 15 年的教义汉语与研究文本中的另外一种跨文化比较方式。在 1861 年,出版他的第一版整套译本的时候,理雅各的评价也已相当成熟和积极。

(一)突出理雅各对孟子所作的比较评价

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理雅各宣称孟子的教义要比孔子的教义更加受人“敬仰”且“睿智”。理雅各肯定了孔子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要比孟子“亚圣”做出的贡献大。理雅各在这卷长经文中看到了孟子如何巧妙地运用比喻和论证的方法、果断的勇气以及积极参与为社会谋利的思考。因此,理雅各

^① 这是费乐仁著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两卷作品的主要争论之一。

懂得了孟子的教义是从孔子的观点出发,但是孟子对部分内容又增加了自己理论及实践具体计划的详细内容,并向欣赏他观点的政客推荐这些计划。如果这种比较是一种过当的话,值得意识到,理雅各在 1861 年对两位儒家圣人的比较评价中重申孟子的教义,在相似观点和同样喜好上,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专家冯友兰(1895—1990)一致。在 1947 年,冯友兰在给美国学生的讲座中,也谈到了孟子如何提高孔子的教义。后来,这卷名为《中国哲学简史》被两次翻译成了中文。数代中国学生也因此能够在过去 25 年中读到这样的文本和看到这样的评介。因为这些因素,大多数中国翻译都和这样的哲学比较有关:^①

孟子对齐宣王所说,无非是“善推其所为”,这正是实行“忠恕之道”。从这里可以看到,孟子怎样发展孔子的原理,使它更加清楚。孔子对他的原理的解释限于个人品德修养的范围,孟子则把它推广到政治和治理国家的范围。孔子解释他的原理时,只讲到“内圣”,孟子则把它推广到“外王”的范围。

即便在“内圣”的范围之内,孟子也比孔子讲得更清楚。在《尽心章句上》第一节,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所讲的“心”,便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性,因此,发展人的本心便是知晓人的本性。在《告子章句上》第十五节里,孟子讲到人的本性,说:“此天之所与我者。”所以,知道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道。

冯友兰与理雅各对两位圣人的评价都包括同一个资料,但是理氏对尚未详细涉及的政治与经济方面也有兴趣。在给两位圣人作比较的时候,理雅各也给他的评价增加了其他角度的评价。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正统儒家和基督新教之间的价值体系与制度关系。

(二)理雅各翻译和评论的两条线路

仔细阅读理雅各第二卷绪论与注解的读者,会发现很多基督宗教和圣经的教义;这些教义使理雅各形成他自己的诠释自觉性(hermeneutic consciousness)的因素。这些都被后来的批评家认为是扭曲他译本的翻译和解释及困惑读者的原因。^②这些批判可以总结为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第一,理

^① 引用自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英汉双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上册,第123和125页。

^② 对理雅各评论、宗教和哲学翻译观点感兴趣的读者,详见费乐仁著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第二卷,221—243页的结论。

雅各基督的模式是从基督新教传统中得到的;第二,在儒教只有一种可以被阐释的传统。事实上,这些假设都是不正确的。在做批判评价之前,读者首先要了解这两点是怎样影响到理雅各理解原文的。这样读者才能够从中收获很大。

首先,理雅各是不从国教的基督新教徒,属于公理会教派。即使理雅各去牛津大学,但是直到他去世也还是没有加入国教的基督新教。理雅各拒绝那些与圣经原则相违背的宗教历史传统及其发展,他还反对利用社会权利在基督组织内部树立宗教权利。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这是基督精神的合理形式,这种形式与国家教堂共存。原则上,他与政府影响力一直在抗争。所以,他们对自己国家政府持批判态度和提防心理。最后,这样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说又是一个不同的基督形式。作为一位理论评论家和反对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宗教斗士,理雅各一直都在战斗着。其实,理雅各明白清教和罗马天主教传统都来源于中东和地中海历史文化。理雅各工作上和中西方跨文化研究的这点认识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更加具体地做出说明。

第二,比起其他国外学者来说,理雅各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儒家传统和學校在他那个时代到底分了多少个派别。东方传统紧随朱熹所解释的传统。早前汉代学识(有时与朴学密切相关)决定了不同的传统流派以及一些地方流派。理雅各的资料都是出自于居住在中原和东南部的学者。理雅各研读了收集到的资料。他试图证明那些翻译拥有着一样的文本翻译原则。理雅各既没有采用单一的翻译观点,也没有跟从固定的一位学者,比如朱熹。理雅各采取了清代学者的评价观点。有时候他选择了按照宋代儒家正统解释。另外一些时候,他又采用了汉代或者清代的翻译方法。理雅各相信他们比朱熹的翻译要更加具备公正性。通过这种方式,理雅各采用了清代文学中更具评判性的趋势。他认为只有一种最好的翻译,同时也为了能够将这部作品与朱熹评论提倡的正统结合起来。理雅各对复杂的中国文化和儒家历史现实提出反对意见。

(三)基督新教理论的跨文化影响

由于不从国教的基督新教徒的生活方式是以圣经为主的世界观,因此,理雅各会直接或间接地参照圣经原则,来支持或批评孟子的教训。比如说,理雅各坚信中国哲学家对人性的洞察力并不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人,世俗

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①用圣经的话就是说在世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即使他们尚未知道是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们,但是仍能展现他们被上帝赋予的道德与智慧(“律法”)。理雅各引用了圣经中所罗门的箴言“如猛狮一般,正义是无畏的”,^②理雅各这是在颂扬孟子的品行。这样做以至于“希腊或罗马的老师都没有孟子这样的正义之感。”^③理雅各坚信的真理对众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孟子教训原则的恰当运用是为指责中国人——以及我们自己——所犯下的无数次罪孽,他们与我们都感到内疚。这些罪孽与内疚都在孟子的教训原则中出(within their sweep)并予以谴责(under their condemnation)。”^④

中国哲学家对人性善的观点,理雅各没有异议。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并不支持罗马天主教以及其他有关的原罪论的基督教观点。相反,理雅各了解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源于罪恶的想法、选择和行为。理雅各的立场受到他哥哥理论作品的影响,因此反映了基督教义的公理会教友和基督新教徒的翻译。^⑤通过这种方法,在人性方面,理雅各认为孟子的观点是“人性是静止的,并且西方基督经典教义不是互相排斥的”。^⑥

所有这些赞赏的话并不意味着理雅各没有发现孟子生平和教义方面的弱点。虽然孟子的道德价值观念既强大也缜密,但是理雅各说孟子自己并没有总是言传身教,这特别表现在他是否应该从他反对的政治家手中得到经济救助。^⑦从这一点,理雅各认为是孟子对所秉承的价值观妥协的行为,也显示出孟子言行不一致,导致其论证毫无意义可言。在道德观念的另一层面,理

① 详见《新约》罗马 2:14—15。这是作品的注解,但是整个文章在和合本中: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法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该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的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为是,或以为非。

② 引用自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74 页。在《圣经》、《新约》和《箴言》28:1 中找到的文本。文中说到:“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这是有关理雅各讨论孟子“精力充沛”的言论。

③ 引用自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64 页。

④ 引用自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65 页。

⑤ 请见 George Legge 著 Lectures on Theology, Science, and Revelation, ed. James Legge and John Legge (London: Jackson, Salford and Hodder, 1863)。这卷也包括了理雅各的记忆。这里面描述了理雅各生活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非国教的家庭里面。

⑥ 引用自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67 页。

⑦ 详见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 53—55 页的相关问题讨论。

雅各发现孟子在不断地追求完美以求得到世人的钦佩。这样做就会让人们真正地相信他的道德观念是可以赢得最高荣誉的。然而,这点并没有帮助人们真正了解人类的善变。最终,这位中国哲学家自觉不如自己伟大的老师孔子。即使这样,有时候孟子很高傲,不愿意给予那些堕落的人类一点怜悯之情。^①对别人无视的特点让这位圣人不完美了。这是因为这与这位圣人所倡导的“大爱”完全不一致。孟子其实并不理解“人类职责的整个领域”。其中的全心全意爱上帝是苏格蘭传教士学者应该尽到的最基本的道德职责。理雅各意识到这并没有违背孟子的教义宗旨,但是他发现孟子的智慧是“不完美的”。^②值得注意的是,理雅各是在墨子的教义中来讨论的基督宗教教义的“博爱”,而不是在孟子的“仁爱”教义中,这是因为理雅各发现前者更接近基督宗教关于人类伦理道德的原则,即使孟子、墨子和理雅各都认为这些教义能改善人类生活与社会进步。^③

理雅各的基督宗教的世界观与本体论对理解孟子的教义又扭曲了多少呢?那么他对自己所处十九世纪清朝末期商业和军事入侵的跨文化情境中有多少不了解呢?这些问题都必须包括进一步研究对理雅各所运用的儒家解释来诠释儒教经文;同时也必须了解理雅各是怎样回答有关大不列颠帝国在香港殖民地以及中国其他地方举动的。在关于这些举动的立场上,理雅各是一位很明显反正统英国文化者:他批评了英国的军国主义不如儒教提倡的仁政,还原则上反对鸦片贸易和商人的贪婪心。然而,他支持在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签订的国际合法条件。这完全归咎于当时清政府对宗教和教育事业的不负责任。他同时也拒绝接受难民,不愿意拿自己个人人身安全冒险。理雅各相信基督文化在中国社会内部能够形成更大的影响。他这样的言论也是“猛狮的胆量”。很可惜的是,他却不能够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

最后,虽然理雅各发现孟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④但是他并不关心落魄的穷困潦倒的人。这样的观点并不适合现代中国所迎接的挑战。理雅各认为“中国新一代的谋略家们将会越来越多。对于这些后起之秀来说,孟子

① 详见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 69—71 页。

② 详见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 72—73 页的相关讨论。

③ 表述在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 121—122 页。

④ 引用自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71 页。

只是学习的榜样,却不是他们的领导者”。^①对于 20 世纪来说,儒家教化和孟子教义影响消失的预言将会成真吗?

(四)理雅各使用的不同中文评论的跨文化影响

理雅各自己也遗憾没人向他介绍清代著名学者焦循(1763—1820)的《孟子正义》这部著作。难道这句话是说理雅各完全被其他二手资料给误导了吗?这里我们先需要更加仔细地验证理雅各用来翻译与评论的主要参考资料,才显示出他为翻译与注释而筹备颇为权威的资料。当然最有影响力的两部作品分别是:朱熹(1130—1200)的正统解释和汉代《孟子》专家赵岐(大约 108—201)的词源学与历史见解。通常说,如果理雅各觉得要挑战正统立场,是因为他在阅读赵岐的注释时发现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材料以外,理雅各引用了著名的司马迁(约前 145—约前 86)的《史记》,因为他大多数采用五个清朝儒家学者的批判性考证著作来挑战《史记》的真实性。^②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当代中国学者的作品都不是那么有名,但是理雅各在他的著作中参考了这些作品。理雅各也用他们来解答有关历史和文本的问题。^③除了这五本资料以外,理雅各经常参考法国学者儒莲的拉丁语版译本。因此,他不仅融入到了中国学者的世界,而且在欧洲汉学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 20 世纪,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1889—1966)批判理雅各过度依赖于朱熹的作品。然而,这样的评论并不完全正确。^④更为真实的情况是:作为一位独立依赖大量中国文献的学者,理雅各虽然在他的译文中有明显的错误,以及蹩脚的翻译,但是他的文本保持了对《孟子》学术研究的透彻度,也为他那个时代的汉学全面性和诠释学论证设立了新的标准。

丁、后世俗时代再思:《孟子》和儒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综合考虑了理雅各对孟子教义的多角度叙述后,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什

^① 引用自 1895 年版《中国经典》第二卷绪论第 76 页。

^② 在绪论和对《孟子》评论注解中,理雅各对这篇文章的参考达到了 30 多次。在整卷中,理雅各对朱熹和赵岐的作品参考次数达到了 100 多次。

^③ 理雅各参考的是每部作品的标题而不是作者。这些包括了皇家钦点的校注书目《日讲四书义解》、《新增四书辅注附考备旨》、《四书经注集证》、《四书拓余说》和《四书味根录》。这些所有的书目都能够在中国经典第一卷中的 128—131 页找到参考文献。

^④ 详见他的文章“Notes on Mencius” Asia Major (New Series) 1:1 (1949),第 99—108。这个文章被加到了《中国经典》第二卷,一些版本中的前面部分。